

引言

数字化浪潮下的公益之感

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，数字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。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事业单位，都纷纷采用数字化手段来提升业务效率和服务水平。在数字化浪潮之下，公益该何去何从，成了不得不直面的一个迫切命题。

数字化，来源于计算机领域，指的是将物理实体、文档、媒体等转化为数字形式的过程，以便供计算机系统理解和处理，并进行存储、传输、操作和分享。数字化可以应用于各种领域，为信息的管理和利用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机会。

利用数字化的方法和工具来处理、存储、传输和展示信息的技术，就被称为数字技术。它涵盖了广泛的领域，包括计算机科学、信息技术、通信技术等，共同构成了数字化时代的基础设施。数字技术催生了许多新兴的技术和概念，如 AI、大数据、物联网（IoT）、区块链等。这些技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，提供了更高效、智能和便捷的解决方案，推动了社会的创新和进步，其发展和应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。数字化是数字技术的核心。

在商业领域，数字技术推动了电子商务、移动支付、O2O（线上

到线下)、数字营销等的发展;在教育领域,数字技术提供了在线学习、AI 教学、虚拟实验等创新的教学方式;在医疗领域,数字技术支持了医疗影像诊断、远程医疗、健康监测等的发展;在政务领域,数字技术通过电子政务、数据驱动决策、开放数据和透明度、智慧城市和智能交通、数字治理和参与等方面的应用,提升了政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。

数字化浪潮带来的种种创新和便利,也是公益领域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。跟上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,意味着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,也是公益发展的广阔新蓝海。道理都懂,然而在近距离观察公益领域时,我们会感受到这个行业的些许彷徨无措。在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浪潮冲击下,公益行业似乎呈现出了要么“过热”(新潮流),要么“过冷”(简单化)的貌合神离之象。

第1章 公益的“新潮化”

网络热词与公益“新思潮”

2020年的某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一个“公益行业如何反内卷”的话题讨论邀约。接到命题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当时“内卷”这个概念刚刚从人类学研究领域通过互联网传播走向普罗大众，坦率地说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新潮词汇的含义。

于是我不太不好意思地询问主办方：“请问‘内卷’是什么意思？‘公益行业的内卷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经过主办方的朋友一番热情洋溢的解释，我发现自己在这个新兴的热词面前显然是“out”（过时）了，更无从发表什么高论，于是尴尬而又不失礼貌地拒绝了这次邀约。

当数字技术带来的互联网创新浪潮一浪更比一浪高之时，人们也经常会被层出不穷的新概念和新热词搞得晕头转向。更可怕的是，对公益的讨论也越来越喜欢“赶时髦”，在社会热词的基础上又层出不穷地衍生出专属于公益的“新思潮”。这种情况有时候会令人焦虑又无奈——刚经受完社会热词的“毒打”，一转身又要经受公益新思潮的“毒打”，只能硬着头皮不停地去学习，接受被“内卷”的命运。

毕竟，谁也不希望自己稍有不慎就陷入了尴尬的“out”了的境地。

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些人会挖空心思、绞尽脑汁抛出一些新概念、新想法、新论争，或者蹭着热点发表一些石破天惊的“独特”思想。创新是好事，然而如果只停留在概念层面，往往一阵喧嚣过后又归于沉寂，真正带来的改变和沉淀很少，所谓破局性的变革更是鲜有其成，最终难免落得一个尘归尘、土归土、嘴炮归嘴炮、老黄牛依然埋头当老黄牛的结局。

如果扒开这些表面的喧嚣往内里细看，其实公益的基本内核，这些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；而再回头追问曾经追捧热潮的公益人，他们可能也是一脸迷茫，浑然不知何以自洽。

公益“新思潮”的表现

这些关于公益的新思潮虽然令人目不暇接，但总结下来大体有三种表现。

一是和各种“热词”的迫不及待挂钩。

2021年互联网界有一个大潮流就是集体diss（轻视）所谓的大厂“黑话”（赋能、闭环、抓手等），然而类似“黑话”在公益圈的活跃度实际上一点也不低。除了开篇列举的“公益如何反内卷”等话题，“私域”“社群”“裂变”“后浪”这些时髦的词汇，更是层出不穷。

当然，喜欢说热词无可厚非，热词之所以热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说，并且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；只是同时也要区分与鉴别表象的“热”与深层的“思”，不要止于热词而不能引起真正的思考与变化。

二是和社会潮流的强行联姻。

这一类情形与上一类看似相似，实则不然。如果说和热词的挂钩，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表达看起来更时髦，那么与社会潮流的强行联姻会更加深入，并形成一套话语体系。“互联网+公益”“大数据公益”“新媒体公益”等，这些思潮在过去的十几年里，可谓各领风骚两三年，在同一时期，关于这些话题的会议、论坛就能开上几十场。也许过不了多久就能看到类似“元宇宙与公益”这样的话题讨论了。当然，实际中这些会议主题的拟定会更为深刻和专业——据说很多话题的组织者，仅仅为了取出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会议主题，就会反复推敲、疯狂脑暴好几天。

一方面，这些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热度的映射，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考和冲击。但只要是潮流就有涨有落，当人们还在试图融入上一个新潮话题时，下一个新概念又以猝不及防之势扑面而来。另一方面，很多讨论者又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的咬文嚼字，缺乏真正的知识提炼，更不用说对实践的支撑与反哺了。

三是对公益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，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论断。

这里所说的是“论断”而非“讨论”，是对公益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直接下结论。关于政府、商业、公益与个人之间的关系，历来有很多讨论，但近些年来人们对于“商业”与“公益”关系的讨论尤甚。这种争论是有益的，有利于认识事物的视角更加多元化。只是在这种争论中需要引起警示的，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、为了定论而定论的倾向：要么全面贬低公益的价值，唯商业为上；要么站在道德制高点，将公益放在商业的对立面。

以上的总结或许还有待完善，甚至可能陷入了“为了批判而批判”的悖论陷阱。但无论如何，公益行业对新潮的追逐可以去芜存菁，在各种纷繁的表述中沉淀出对公益发展有益的部分。新概念、新思潮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，关键要触及隐藏在概念背后的本质。

从数据看“新思潮”与公益发展

如果沉浸于这些新潮的话题讨论，可能会认为数字公益正以如火如荼之势快速发展。这些年令人欣喜的公益增长数据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印象——历年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，自2014年以来，中国内地社会捐赠总额（含物资）持续保持在1000亿元以上，2020年更是历史性地突破了2000亿元；与此同时，通过互联网公益平台捐款的人数和金额更是快速增长。

那么公益这些年的快速发展与这些新潮话题之间，到底是“鸡生蛋”还是“蛋生鸡”的关系？公益又是否真正地走上了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发展快车道呢？

可以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来更加辩证地思考这个问题。2008年被公认为中国公益发展的新元年，当年发生的南方雪灾和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，引发了海内外空前的慈善热潮；全民参与的救灾行动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，也掀起了志愿服务的热潮。从数据层面来看，当年社会捐赠总额达到了1070亿元（前一年这个数据只有309亿元），个人捐赠占比也达到了空前的54%（这个比例至今未被超越）。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历年的数据走势就会发现，自2008年之后，社会捐赠总量的变化一波三折，占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的比例也一直处于0.2%以下，不足慈善较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。

通过这些数据的展示，我们可以有两个初步结论：

其一，尽管话题讨论上的新思潮层出不穷，但并不代表公益的发展已经完全入轨数字经济，还缺少实质意义上的变革。

其二，社会捐赠总量与 GDP 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同步性，这也说明了近年来公益的发展并非拜“新思潮”所赐，而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带动。

关于这一部分的数据分析，后面的章节会进行详细的论述，并且大家将进一步发现：虽然这些年公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但发展程度与所处的数字经济时代相比，仍然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。

当然，公益的发展程度不能仅仅通过社会捐赠总量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。除此之外，慈善组织、志愿服务、法律法规、社会关注、企业投入等更多方面都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。但就新思潮与公益之间到底是“鸡生蛋”还是“蛋生鸡”的关系而言，通过对社会捐赠总量这个指标的分析足以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：这些看似热闹的论辩，更多还是停留于表面的概念包装，并没有真正地带来实质性的变革。